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宫崎市定 亚洲史论考九杂纂

「日」宫崎市定 著 马云超 张学锋 译

10

非外借

《亚洲史论考》上卷前言
《亚洲史论考》中卷前言
《亚洲史论考》下卷前言
杂纂
附录

砺波护《亚洲史论考·中文版序》
张学锋《亚洲史论考·译后记》
张学锋《“宫崎史学”的东西交通视野》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宫崎市定 亚洲史论考杂纂

「日」宫崎市定 著 马云超 张学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杂纂 / (日) 宫崎市定著; 马云超, 张学锋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5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ISBN 978-7-5325-8817-6

I. ①宫… II. ①宫… ②马… ③张… III. ①亚洲—历史—研究 IV. ①K300.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7355 号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杂纂

[日] 宫崎市定 著

马云超 张学锋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5 插页 5 字数 94,000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5-8817-6

K·2479 定价: 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 | | |
|---------------------|-------------|-----|
| 《亚洲史论考》上卷前言 | · · · · · · | 一 |
| 《亚洲史论考》中卷前言 | · · · · · · | 一四 |
| 《亚洲史论考》下卷前言 | · · · · · · | 二〇 |
| 杂录 | · · · · · · | 二六 |
| 历史学的实证性 | · · · · · · | 二六 |
| 历史评价的客观性 | · · · · · · | 三三 |
| 东洋史学的研究方法 | · · · · · · | 四三 |
| 旧著《京大东洋史》后记 | · · · · · · | 四五 |
| 《东洋史研究总目录》序 | · · · · · · | 四九 |
| 冯道与汪兆铭 | · · · · · · | 五八 |
| 余白录 | · · · · · · | 六三 |
| 《唐宋时期金银研究》献疑二则 | · · · · · · | 六三 |
| 王建诗再论 | · · · · · · | 六六 |
| 关于「可汗」的读音 | · · · · · · | 六八 |
| 象群的后退 | · · · · · · | 七〇 |
| 幽云十六州的地图 | · · · · · · | 七二 |
| 雍正二年版《缙绅全书》和《中枢全书》 | · · · · · · | 七三 |
| 向陵的围墙 | · · · · · · | 七七 |
| 书评 | · · · · · · | 七九 |
| 《论语》与孔子思想(津田左右吉著) | · · · · · · | 七九 |
| 中国身份法史(仁井田陞著) | · · · · · · | 八四 |
| 中国法制史研究(全三卷)(仁井田陞著) | · · · · · · | 八七 |
| 中国史的历史分期(铃木俊 西嶋定生编) | · · · · · · | 九二 |
| 宋诗概说(吉川幸次郎著) | · · · · · · | 九九 |
| 跋 | · · · · · · | 一一一 |
| 附录 | · · · · · · | 一一五 |
| 《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序 砺波护 | · · · · · · | 一一五 |
| 译后记 | · · · · · · | 一二三 |
| 「宫崎史学」的东西交通视野 张学锋 | · · · · · · | 一二七 |

《亚洲史论考》上卷前言

这一本冠以我姓名的《亚洲史论考》由上、中、下三卷组成，上卷定名为《概论编》，中卷为《古代·中世编》，下卷为《近世编》，计划按顺序陆续出版发行。

在上卷的《概论编》中，收录了我出版较早、并且现在均已绝版了的单行本五种和短篇论文一种。自己当初设定的选书标准，正像该卷定名为《概论编》所显示的那样，尽量选择那些能够反映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专业性不是太强、容易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篇章。尽管如此，收录的各种书籍和论文，自有其不同的成书背景，因此又很难全部满足上述标准。

首先收录的是《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这

个单行本原是羽田亨博士^①主编的《支那历史地理丛书》^②中的一种,也是我最早出版的单行本著作。我大正十四年(1925)^③大学毕业,这本书的出版是在昭和十五年(1940),其间相隔约十五年。因此可以说,这个单行本总结了我这十五年间对东亚历史问题的一些研究心得;而书的出版,也得以使这十五年间的研究工作告了一个段落。然而,这个单行本毕竟是距今三十五年前的东西了,内容上有诸多不到之处,文章也显得稚拙,如今再次刊行,难免让人汗颜。然而反过来想,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得到过学术界的认真讨论,很多观点就此被束之高阁,因此,今天看来,此书并非完全是无用之物。

参照古代希腊的社会发展阶段,将中国上古时期春秋前后的社会称为“都市国家”^④时期,这在日本恐怕是本书最早提出来的。此后虽经三十余年,直至今日,我更加确信这一提法并没有错。但是,在我国学术界中,赞成的人当然是少数。自己提出的这一观点几乎不被人们所接受,这对于我来说无论如何也理解不

① 羽田亨(1882—1955),1907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支那史学科,1909年任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后升任副教授。1922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24年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在北亚史、西域史、中亚史、敦煌学、东西交通史、民族学等各领域成果卓著,著有《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上下卷等。本书中着重号为原作者所加,脚注均为译者所加。

② 本译著中,原著叙述中出现的“支那”一词均改为“中国”,为保存必要的历史感觉,“二战”结束以前出版的图书论文,以及同时期的学科名称、学会名称等专有名词中的“支那”一词不改。

③ 原著中多用日本年号纪年,括注中的公元纪年为译者所加,以下不一一说明。

④ “都市国家”是宫崎市定对古代希腊 polis 的翻译,我国学术界通常译成“城邦国家”。“都市国家”是宫崎市定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命题,为免产生歧义,本译著将与之性格相似的中国春秋时期的城邦国家径译为“都市国家”,而将欧洲历史上的 polis 译作“城邦国家”。

了。人们不愿接受的理由,如果是因唯物主义史观无视或者轻视都市国家的存在所致,那么,不得不说这真是太无聊了。历史研究中的理论,只有能够更好地解释历史事实才有它存在的意义。以理论为中心,选择一些合乎理论的史实来证实或充实理论,若以此为能事,这就不是历史学了;同时,理论也就不称之为理论了。如果都这么做,不就陷入唯物史观的观念论之中了吗?

至于站在西方史学的立场上,从都市国家的定义出发,认为如果满足不了这个定义中的种种条件就不能称之为都市国家,对于这种原则性的批评,同样也无法首肯。说实话,这样的定义,即使是在都市国家最典型的古代希腊,恐怕也难以成立,谁也未曾论证、也无从论证曾经存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无数的都市国家,它们中间的每一个都完全合乎都市国家的定义。事实上,能够详尽到如此程度的历史学在这世界上是不存在的。因此,这种批评,不得不说是过度崇拜西方文化的弊端所致。

除此之外,本书在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理解中,还对“春秋五霸”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春秋五霸”,我认为是异民族在华夏化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这一场起因于异民族的强国之间的争霸,到了战国时期变得更加炽盛,甚至在楚汉之争中都可以寻觅到它的影子。经过堪称古代帝国的汉王朝四百年的统治,各民族之间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同文同种的民族意识。

从三国开始,中国进入了中世纪,新的对立在汉人和北方各族群之间兴起,欧洲中世纪呈现出来的那种民族大迁徙,在中国

也发生了。异民族不断侵入中国内地,并在中国内地定居、同化。作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征,我注意到,异民族对中国文化的憧憬是非常强烈的,而固守自己民族传统习俗的意识却很淡薄。在社会经济方面,构成这一时期历史特征的均田制,其本质与此前政府按一定标准向农民授田,培植小农经济,将重农政策推向极致的神话般的理想主义土地分配制度不同,它反映的正是这一时期因大土地所有制的盛行而导致的土地集中的社会问题,所谓的“均田”,实质上只能是天子庄园中的土地。

这样的社会结构一直持续到唐代,因而,将唐帝国视作中世纪国家是非常贴切的,在国家性质上,唐帝国与在上古都市国家的残骸——乡亭集合体基础上形成的汉帝国大不相同。基于这一认识,对那些将汉唐视为前后相承的古代帝国的学说,我是无法赞成的。唐帝国的弱点也正在于其具有中世纪的时代特征,因此大唐盛世不会长久。唐中期以后,由于军阀割据愈演愈烈,国家分裂的倾向也日益加强,最终迎来了五代十国的对立局面,中世纪也随之告终。

将宋朝以后视为中国的近世社会,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内藤湖南博士以来的传统。从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出发,这一学说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动摇的。从社会层面上来说,中世纪的门阀贵族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近世社会特征的读书人,即士大夫构成了国家的统治阶层。读书人即士大夫阶层的形成,朝廷的官员录用制度即科举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科举制源

于隋朝,进入唐朝以后日渐兴盛。科举出身者的势力日益加强,以至于结成党派与门阀贵族争势夺利。进入宋代以后,贵族势力彻底衰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阶层独占了朝廷的显要地位,成为政界和官场上的核心力量。

隋代开凿的大运河,其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以至于最终成为中国交通运输的大动脉,这也是进入宋代以后才完成的。宋代以后,中国社会几乎完全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以至于各地的很多物产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商品来生产。与商品经济发展同步的是商业城市的兴起,这也是中世纪见不到的现象。宋朝政府为了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倾全力增铸铜钱,扩大货币的流通量。中国近世的士大夫阶层,也就是在这种经济形态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在农村,他们是大地主;在城市,他们是大资本家。他们以财力为基础,教育子弟,使其科举及第,从而进入仕途,获得官僚的地位。

平定五代诸国、统一中国的宋王朝,不得不再次承受与北方民族对立的命运。从此以后的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接一个的北方民族——辽、金、蒙古,民族变了,但势力却越来越强。进入近世以后出现的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与中国对立的北方民族,无一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与此前相比,宋朝以后崛起的北方民族最具特征性的一点就是,他们都创造和使用了能够表达本民族语言的文字。他们的民族自觉性来自历代北方民族被汉族同化、融合,最终走向民族消亡的历史教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

他们在保存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金比辽更加强盛,代金而起的蒙古则更加强大,以至于建立起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然而,他们虽然在保存本民族的传统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他们民族固有的传统中却缺少优秀的文化,在优秀的中国文化面前,最终没有能够逃脱衰败的命运。

对上古社会而言的中世纪社会,以及对中世纪社会而言的近世社会,无一不是对前一个时代的否定。然而,对近世社会而言的最近世(近代)社会,并不是对近世社会的否定,而是近世社会性质加速发展的结果。在这个单行本中,已经没有论说近代东洋问题的余暇,故止于近世。

接下来收进本《论考》的是《中国古代史概论》、《六朝隋唐的社会》和《东洋的近世》三种。这三种是《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出版十余年后问世的,可以说是用这十几年间获得的新知对前者的一个补充,观点和立场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史概论》^①中我认为,中国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起源更加悠久的西亚文化的影响。本书还对欧亚大陆铜、铁两种文明的产生与传播路线进行了图解,在此基础上,对古代史中的一些问题试着做了解释。

《六朝隋唐的社会》是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一篇论文,在本

^① 在京都学派和宫崎史学中,“中国古代史”或“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古代”,指中国有史以来至两汉时期的历史与社会。

《论考》中实属例外。之所以要选录这篇论文,是因为在古代与近世之间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性的说明。在这篇短文中,我并没有准备对中国的中世纪历史进行深入的探讨,而只是通过一些并不连贯的史实来描述凄惨的中世纪社会的另一面,表明我对中世纪这个时代的基本看法。近来有一种倾向,就是试图否定中世纪社会的黑暗性质,有的甚至发展到了赞美中世纪的地步。对于这样一种风潮,我无法与之同调。

在《东洋的近世》^①一书中,我比较详细地对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变迁问题进行了论述。由于本书中没有能够将立论的史料一一列举,因此招来了种种误解,有时甚至成为猛烈批判的目标,这实属不得已。其中关于部曲和佃户的社会地位问题,受到了仁井田陞博士的批评。然而,我能够得出书中的结论,自有我掌握的充分的史料依据。关于这些问题,我所作的详细论考,将会在本《论考》的中卷中有所收录。通过这些论考,我相信已经完全能够应对仁井田陞博士的批评了,读者可以放心地阅读本书。

上卷中除收录了以上几种与中国史有关的论考外,还收录了《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和《菩萨蛮记》两种。前者其实是一个短篇随笔集,将之收进《概论编》中或许有些不妥,不过我的想法是,关于日本与中国历史上的关系问题,即使我的认识还没有形成什

^① 《东洋的近世》原意为“具有东方特征的近世”,本译著径用原著旧题。

么体系,但我依然希望给读者留下一个印象:我们对中国史或其他国家的历史抱有兴趣,并对之展开研究,最终目的是要将之与本国的历史联系起来,声称对本国的事情不了解并因此逃脱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本书既然冠名“亚洲史”,如果将日本完全排除在外,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不过,《日出之国与日没之处》成书于“二战”期间,今天再次阅读,不可否认,在我的撰述意图中确实有些“发扬皇威”的意思在里面,措辞上也显得有些过时,今天来看简直毫无办法。然而对我来说,那种动不动就通过揭露自己国家的劣根性来表示进步的现代风潮,反而令人觉得不适。还有,如书中的《倭寇的本质与日本的南进》一篇,因当时急于表达自己的主张,今天看来已经完全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现在看来还不如强调它与当今的研究热点——农民起义之间的共性呢。不过,我对所谓的农民起义,就像对倭寇一样,对他们的行为无法完全支持。

《菩萨蛮记》是在昭和十二年(1937)笔者遍游西亚之际的游记基础上,粗线条地增补了这一地区的历史概貌后形成的。直至今日,日本对这一地区的研究都不能说已经非常充分,何况是四十年前,那就知之更少了。不过,我所在的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在桑原鹭藏和羽田亨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对西方的关心程度出奇强烈。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我,在留法期间,因有机会前往巴尔干地区,事后似乎很自然地就把脚伸向了西亚。还有,在巴黎期间,我竟不自量力地想学习阿拉伯语,并试着在东方

语言学校接受入门教育。最终当然没有学会多少,但回国后还是召集了想学阿拉伯语的同好者,自己像一台录音机似的,把在巴黎学到的那一部分内容播送给了他们。以后我自己倒是全部忘记了,却因为有了这个机缘,今天我们研究室的阿拉伯问题研究者辈出,每念及此,我心中不免暗自骄傲。

升任京都大学教授以后,我一心想振兴西亚史的研究,曾连续几年向文部省提出申请,希望在国立综合性大学设置有关专业,但直到我退休,这个愿望都没有能够实现。然而考虑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西亚历史的研究必须展开,于是与同好们商量,在开设新专业得不到批准的情况下,我们设置了西南亚细亚史的研究方向,为有志于这一研究方向的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平台。结果不出所料,十余年后,石油危机一夜之间冲击了日本,朝野上下狼狽周章。受石油危机的冲击,整个社会陷入了恐慌之中,政府高官这个时候发话了,声称日本学术界对西亚的历史毫不关心,对它的研究几乎是零。听到这些言论,真让人气愤至极。我的《菩萨蛮记》虽然谈不上什么精深的研究,水平也没有达到那么高的程度,但可以说除此之外恐怕已经没有同类的书籍能够超过它了。

学术著作的出版,听起来好像很神圣,但仔细想一想,又似乎是一种罪恶深重的行径,因为最终还是要向弱势的同行们抽取头钱。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过了这么些年的旧作重新出版之际,为

使不产生误解,我感到有义务首先应该表明我对历史学的态度。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不喜欢当今流行的理论历史学,如果试图在我的著作中寻求这方面的东西的话,那就完全是找错门了。

大正末年,在我还是京大学生的时候,理论探讨的学问也是非常流行的。文学部的西田几多郎博士,经济学部的河上肇博士,他们的讲课在当时全校中是最有人气的,我也和众多的学生一样赶去旁听。说实话,他们的课如果只是听听的话,那真是非常有意思,但是,我却没有就此将那些内容进一步深入下去的愿望,因为听着听着就不知不觉地产生了许多疑问且挥之不去。

西田博士在上“哲学概论”课时讲到,所谓的客观存在,不过是人的意识根据先前的经验模式组装起来的,听到这里我尚能理解。然而再往下讲,说是站在数学的立场上来讲,三维的世界可以通过四维的世界来思考,然而,四维的空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现实中存在的只有三维空间。听到这里,我已经是云里雾里了。

河上博士在他的“经济学原论”课上,曾经利用唯物主义史观来说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据他的介绍,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里,阶级没有出现,奴隶也不存在,这是因为人类的劳动生产力还很低,自己只能生产出养活自己的那一部分生活资料,这时如果有人想把他人作为奴隶来进行压榨,事实上是没有剩余产品可供榨取的。然而,随着人类物质欲望的不断膨胀,生产力提高了,

除了能生产出养活自己的那一部分生活资料外,还能够生产出剩余产品。因而出现统治者,利用掌握的权力将他人变作奴隶,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就有了可能。人类社会在这个时候也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了奴隶社会。

我一边听着这样的课一边在思考,被称作奴隶的人们,完全没有人身自由,在奴隶主眼中,他们只是财产,因此与家畜无异。家畜则由人饲养,人类在喂给了足以维持其生存的饲料后,让其从事生产活动,从而榨取它的剩余价值。然而,在野生动物被驯化成家畜的过程中,人们是否也要等到这些动物的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才开始的呢?当然不是,这只能是人类在掌握了驯化动物的技术以后开始的。也就是说,问题在人而不在动物。由此看来,奴隶制也一样,问题应该在奴隶主一方,而不在沦为奴隶的一方。因此应该这么说,当一部分人掌握了将另一部分人掠为奴隶的权力,并为榨取剩余价值而强迫其劳动的时候,奴隶制产生了。

我虽有各种各样的疑问,但最终都没敢向先生们提出。其实,即使是再幼稚的问题,我相信先生们也一定会认真耐心地给予解答,但就怕先生们越是耐心恳切就越让人觉得不好过,一旦开出这个那个的参考书让我阅读,那麻烦就大了。河上博士介绍的历史分期,我知道是依据维尔纳·桑巴特的学说而来的,如果先生让我再去详细阅读桑巴特的著作,那就要了人命了。尤其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先生,如果要我读而我不读,这心里就太不

是滋味了。幸亏我是立志研究历史学的,自己觉得这一类疑问即使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也无碍大事,因此厚着脸皮不读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更进一步说,桑巴特是相信马克思的学说的,我有一种感觉,他的历史分期学说,仅止于将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事实在看,并在其上再赋予理论,因此他的重点在于理论的构建。这一点,我们实在无法遵从。稍微想一想就可以明白,作为由个人建立起来的某种理论体系,其精密程度无论有多高,其实都是有限的,一定会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破绽。与之相对,人类历史则是由亿万人民共同创造的,其雄大庄严无可比拟,不必非得用某一个人的解释或理论去观察,而应该通过史实去观察整个历史,将观察的结果就此记录,这才是历史学家的任务。

我这样说或许马上就会招来反驳:按你的说法,历史不还是跟过去一样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吗?人民的历史在哪里?对于这样的非难,我的辩解是:历史是一个整体,必须带着综合的眼光去观察它。有了统治者才会有被统治者,同样,有了被统治者才会有统治者。如果无视这一事实,即使你想强调作为被统治者的人民大众在历史发展中的独自性,其结论只会距离史实越来越远,做出的努力也会付诸东流,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不错,过去的历史记载确实是以帝王为中心展开的,但是,在帝王的背后却有着无数民众的影子。我们应该看到,正是这无数民众的存在,帝王的言行、帝王的政策才因此受到制约。因此,问题在于历史学

家在构建历史之前阅读史料时的态度,这个态度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历史学家绝不能失去平民百姓的感觉。之所以这么说,譬如文学上可以有贵族文学的存在,哲学上可以有精英哲学的存在,但就历史学而言,凭贵族感觉或精英意识去阅读史料或撰写历史是危险的,历史学只能是平民感觉的历史学。虽然这么说,但要实现这个理想却非常困难,因为一个历史学家自称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但在旁人看来往往却并非如此。正因为如此,止于观念上的进步主义者和限于行动上的革命家才会层出不穷。归根到底,历史学家的优劣,本人的自我标榜其实没有意义,必待百年之后由公正的第三者来裁决。

宫崎市定

1975年9月